



青年作者的釜戒

—— 刘绍棠批判集

东海文艺出版社

• 213 •

青年作者的鑑戒

——劉紹棠批判集——

本社編

青年作者的鑒戒

——刘紹棠批判集——

※

东海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

(杭州武林路138号)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2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新華書店浙江分店發行

※

开本787×1092耗 1/32 印張6 3/4 字數173,000

1957年12月 第一版

195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80

統一書号：10125·70

定 价：(6)五角五分

編輯說明

在反右派斗争中，文艺队伍中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其中也有不少青年文学创作者。在青年文学创作者右派分子中间，以刘紹棠为最典型。

为了帮助读者对刘紹棠有一个较系统、较全面的认识；也更是为了使广大青年文学创作者能有一个前车之鉴，不致重蹈复辙，我们将反右派斗争开始到现在，在“文艺报”、“文艺学习”、“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的，对刘紹棠的右派言行及文艺思想的揭发和批判文章收集起来，印成这本书。同时，还附录着刘紹棠的几篇有毒的论文和作品，以供参考。

編者

1957年11月

目 录

从刘紹棠的墮落中吸取教訓·····	“文艺报”社論 (1)
青年文学創作者走哪一条道路·····	“中国青年报”社論 (5)
一个青年作者的墮落·····	“文艺报”报导 (10)
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	高歌今 (19)
刘紹棠是怎样走向反党的·····	房樹民 (25)

我們要把刘紹棠当作一面鏡子·····	茅 盾 (34)
島青年作家·····	老 舍 (38)
党和人民不許你走死路·····	康 濯 (43)
刘紹棠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	严文井 (56)
沉重的教訓·····	郭小川 (68)
唯有革命者, 才能作革命作家·····	楊海波 (77)

关于写眞实和独立思考·····	茅 盾 (85)
談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	以 群 (89)
反对文艺队伍中的修正主义·····	宋 垒 (99)
正确地理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的 意义·····	彭繼昌 (110)
一篇恶毒歪曲新农村的小說·····	房樹民 (115)
刘紹棠所探索和追求的·····	李心影 (122)

刘紹棠笔下的大学生活.....	肖 玫、王积賢 (130)
險恶的用心.....	陈庆英 (136)

附 录

我对当前文艺問題的一些淺見.....	(145)
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154)
暮春灯下随笔.....	(162)
田野落霞.....	(166)
西苑草.....	(190)

从刘紹棠的墮落中吸取教訓

文藝報社論

和整个文学艺术队伍所經歷的情况一样,青年文学工作者的队伍,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也經歷了一次不可避免的分化,一批人墮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刘紹棠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实例。他墮落的过程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帶有右派文学青年的普遍特征。

刘紹棠,这个不过22岁,一直在党的教导培养下生长起来的、在新社会渡过全部青春时期的年轻人,他的悲剧,是从他离开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忘記了劳动人民养育之恩的时候开始的。

起初,他写了几篇作品,表现了他的一点写作才能,党和文学界就給他支持和帮助,讀者也給他不少鼓励,期望他做一个勤恳踏实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工作者。但是,在他有了点小小的声望的时候,就驕傲起来了,顛倒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劳动人民和作家的关系,以为创作源泉不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相反地,却是他自許的“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式的个人才能。在这种狂妄思想的支配下,他离开了使他的才能生根发芽的农村。从此以后劳动人民在他的眼里已經不是他的亲人和养育者,不是他所服务的对象,而成为他显身揚名的垫脚石了。

他背离了劳动人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内心里就迅速地膨胀。到他发表作品、出版作品比較容易,积攒的版稅日益多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写作是爭取名利的捷徑,就确定把文学写作当做进身之阶,求名逐利的敲門磚,要在文学界运用资产阶级手段为个人名利而斗争了。这

时候，刘紹棠已經不是孤立的，他找到了和他情投意合的一小撮知己。他們在一起，象研究商业行情一样地研究文坛登龙术，找寻发表和出版作品的窍门；互相吹捧，蜚蜚撼大树似地誣蔑老作家，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且四处活动，企图把持几个刊物，好顺利地发表自己的作品；他們也有“理想”，那就是盘算着有朝一日能爬上文学界的领导地位。——他們的所作所为，听起来可耻而又可笑，但是他們却把这当做从事文学事业当然的方法和目的。

既然热衷于追逐名利，想通过文学创作无限满足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要受到阻挠和限制，于是他们就感到生活、思想和创作的不自由，从内心里发出对党的政策和社会生活敌视的情绪。他們从厭棄到公开攻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抗拒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附和并宣扬国内外的修正主义思想与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论调。近一年来他們不仅通过作品歪曲和誣蔑新社会的生活，并且狂妄地希图在农村建立“实验区”，让工农干部只搞生产，把精神领域的任务分給他們，让他們办刊物、办剧团，办民办中学，让他們去进行精神领域的“改造”和“建设”，用资产阶级思想去“化大众”。

刘紹棠就是这样从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生力量堕落成为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人的。

由骄傲、个人名利思想的上升，以至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制度相违抗，最后发展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野心家，成为文学界资产阶级右派的有力帮手，这是一切右派文学青年堕落的共同规律。

青年有朝气蓬勃，热爱学习，上进心强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幼稚和不成熟的天然的弱点，他們对于真理和恶还缺乏足够的分辨能力，由于年龄和鍛鍊不足的原因，他們的身上也缺乏强有力的抗毒素，也就容易为资产阶级思想所俘掠。以为青年文学工作者可以不经过艰苦的道路和严重的教育就自然会执行党的文艺方针，这是天真而有害的。

想法。刘紹棠的墮落就向我們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这一次，青年文学工作者队伍中所发生的許多严重問題，实际上反映了党内外資产階級右派向我們爭奪文学青年領導权的斗争。丁玲、陈企霞、江丰、吳祖光这些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懂得文学青年的心理和要求，知道青年們的弱点，也就利用了这弱点向青年进攻，腐蚀青年。他們廉价地为青年捧場，故意不适当地抬高文学青年的地位，唤起文学青年的名利心和虛荣心，縱容青年的驕傲思想，并且阴險地包庇青年的錯誤，为他們的缺点做辯护，用这一切办法挑起青年們对党不滿，反对党的严格监督和管束，仇恨党，而去投靠各色各样的反党集团。刘紹棠反党的小組織活动，也就是在这一种空气下面形成的。

刘紹棠等人提出了“写实論”、“靜动論”、“文人性格”等字面上都不通的口号，其实他們何尝有甚么理論修养，何尝在創作中有甚么深切的体会，他們不过是从修正主义者和老一代的右派分子那里学样罢了。修正主义者和老一代右派分子們，利用文学青年在創作上存在着困难和苦悶的現象，把自己打扮成最懂得創作，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样子，引誘青年离开火热的斗争生活，离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这种理論正好投合刘紹棠等人的口味，在他們把文学事业当做追逐个人名利的敲門磚的时候，这种理論所指出的正好是輕而易举的道路。所以刘紹棠等人就把这种理論改換成了半通不通的形式，举起青年“革新家”的旗子，向党提出叛逆的口号来了。

所以說，只有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全面击潰文学界資产階級右派的进攻，才能巩固青年文学工作者的队伍，巩固党对文学青年的領導权。

培养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生力量，是我們发展文学事业坚定不移的一条方針。8年来，我們文学战綫上出現了大量优秀的有才能有发展前途的新战士，尤其是去年召开了全国文学青年創作者會議以后，更

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視，这本来是新社会值得庆幸的好現象。但是由于經驗不足，我們还不能全面地掌握青年文学工作者生长的規律，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缺点。特别是近两年来，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鼓励多于批評，过分的不适当的贊揚多于严肃的尖銳的批評；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发表和出版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某些作品，也缺乏严格和認真的审查和挑选。这就容易助长他們的驕傲思想，名利观念，不能提高他們把文学事业当做对千百万讀者服务的强烈的責任感，不能刺激他們深入生活和进行刻苦的創作劳动。

更加不利于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的是有些地方过早地讓他們职业化。在他們更需要經受劳动鍛煉、繼續进行思想改造、积累生产知識和斗争知識的时候，就使他們脫离了和劳动人民的直接联系，成为两脚虛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空头文学家，这不但違背了文学工作者的生长規律，也違背了教育青年一代的基本方法。許多青年在职业化以后，脫离了創作的唯一源泉，不但創作才能枯萎了，而且也因为和生活和斗争游离了的緣故，就受到资产階級思想的侵襲而墮落下去，为党所哺育的而又用他的作品来反党的刘紹棠對我們來說，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訓！

陆定一同志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會議上所講的：

青年作家不应该只偶尔去“體驗生活”，而應該象毛主席所說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羣众中去”。最好是参加劳动，其次是参加基层工作，要同工农兵同生死，同患难。

这是培养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基本方法，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原載文艺报 28 期）

青年文学创作者走哪一条道路

中国青年报社论

我们的文学事业是崇高的事业。它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许多青年同志们热爱和向往这一事业，怀着崇高的愿望和理想，立志要在工人阶级文学的队伍中，充当一名战士。这种愿望受到我们社会的热烈支持。我们欣欣向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广大劳动人民对自己文学事业的热爱，老作家无微不至的帮助，特别是党和国家多方面的关怀，这一切条件都为立志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是任何时代，任何非社会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在我国文坛上，出现了许许多多朝气蓬勃的新手，他们遵循着党所指出的这条光明大道前进，并且已经取得不少成就。就照刘绍棠早期的情况来看，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解放时，刘绍棠还是一个幼稚的少年。当他显示出爱好文学，并有一定文学才能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党、文艺界和社会的热情支持，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下，他写出了一些比较生动地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清新和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当人们正期待他有进一步成就的时候，大家痛心地发现刘绍棠变坏了，他拒绝了走党所指引的道路，甚至忘恩负义地攻击党，堕落为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了。

那末刘绍棠自己所选择的是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从他后来所发表的一些作品、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创作生活以及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面貌上，我们可以完全看出他在追求什么和反对什么；他在爱什么和恨什么。

刘紹棠在追求“創作自由”。他所謂的創作自由，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也就是說要毫无选择地、用墮落的资产阶级的情調和趣味去写所謂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这也就是他所再三追求的“写真实”。他一再唱着要写“人的命运”，要写“悲欢离合”，要写“令人流泪”的作品。他还高喊“硬要艺术，不要政治”。很显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这就要求它在题材的选择上要有典型性，能引导人們前进和向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是经过概括的真实；而不是自然主义的，毫不加选择的。何况，刘紹棠的所謂“真实”，不过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歪曲而已！

其实“創作自由”也并不是什么新的玩艺。列宁同志早就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所謂“創作自由”的騙局，他說：“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和演員的自由，不过是戴着假面具的”（或者戴着伪善的假面具的）对于錢袋的依賴、对于收买的依賴、对于豢养的依賴。”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列宁同志指出，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将不是替飽食終日的貴妇人服务，不是替百无聊賴和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些劳动人民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再想一想在旧中国的情况。我們不会忘記，当殷夫、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洪灵菲等等这些天才的青年作家，剛剛放出第一朵鮮花的时候就被国民党給枪杀了。这叫什么“創作自由”？新旧社会对比，究竟那个有創作自由，那还不明显嗎？

刘紹棠在追求“創作生活自由”。他認為作家是否要参加一定的生活，是否要在基层生产中担任一定职务，这是一个方式問題。因此他便选择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作品題材是写他的家乡农村，但是他既不在农村参加一定工作，也不住在农村，却长期逍遙自在的住在北京，只是偶而帶着北京做好的干粮下乡去走馬觀花一看，旁觀一番。

这样“自由”地长期不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去，创作的源泉枯竭了，他的思想感情也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远远地脱离了。刘紹棠高唱的“天才”和“技巧决定一切”，实际上是在北京写一些粗制滥造的灰色的思想反动的作品。他写的“田野落霞”，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新农村的生活进行了恶意的歪曲。“西苑草”则是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阴暗情绪来改造党。这些作品的矛盾都是作者臆造出来的，不但没有任何的真实性和生活气息，而且是极端恶毒的毁谤。

特别严重的是刘紹棠的极端狂妄自大。他忘记了党是怎样把他培养起来的。相反的，在稍有一点成就之后，就自认为是了不得的天才，了不起的大人物了。他目空一切，不仅否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需要改造，相反的他已决心以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别人，改造党了。并且进而跟其他的资产阶级右派一起，猖狂地攻击党的文艺路线，诋毁党的文艺政策，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否定苏联和我国近几十年的文学成绩。这样他就完全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应有思想品质，而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了，这也就是刘紹棠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结果。

从最近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被揭发，从刘紹棠等一些青年作家堕落为右派分子，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文艺界中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我们文艺界的队伍中，还有这样一些败类。他们竭力要把我们崇高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变为他们个人追求名利的阶梯。他们提倡什么“一本书主义”；说什么要“留芳百世”；高唱要追求什么“艺术性”。他们污蔑党的领导，拒绝思想改造，并且在生活上、道德上腐化堕落。他们时刻在腐蚀青年，企图把文艺青年引向毁灭的道路。因此，为了保卫和发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为了纯洁和壮大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我们正面临着同资产阶级右派的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一切从事文艺工作的青年，都要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并且在斗争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

想，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觉悟。要作一个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就首先要使自己具有崇高的灵魂。

陆定一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里，特别指出知识分子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的道路，那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这种知识分子充满自私自利的思想，争名夺利，稍有成就目中无人，骄傲自大，只能受赞扬而受不得批评。我们所以要采取的一条道路，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道路。那就是让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到工作中去，到群众中去，经常受到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越是有学问有成就就越尊重党的领导，越是谦虚谨慎。对文艺工作者说来，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得更为尖锐。这不只是因为前面所说的今天在文艺界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也由于文艺本身的特点。文学所反映的是阶级的集体的群众斗争，而写作又是通过个人的劳动。同时我们的社会给予作家在物质上、荣誉上的待遇也是特别的优厚。这就使得那些没有经过很好改造，而又缺乏随时警惕的青年，容易脱离群众，脱离领导，把荣誉全归于自己，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容易滋长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思想，在生活上和道德上，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跟资产阶级反动的“自由论”相反，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比其他人更要强调党的领导，更要强调改造思想，更要强调和工农群众结合。

刘绍棠的堕落，为我们敲起了警钟。我们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都要坚决地跟资产阶级道路划清界限。我们要坚决地遵循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立志做一个有出息的无产阶级作家。要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生活里去落户。在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下，首先做一个优秀的工作者，其次是个业余的作家。这里，我们认为青年文学创作者过早的职业化是不妥当的。它会使青年文学创作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领导。

一场激烈的反右派斗争还在继续和深入。我们相信，在这次深刻

的反右派斗争中，我們一定能够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我們青年文学創作者一定能够得到更深刻的鍛炼。我們的文学事业一定会更加繁荣茂盛。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7年8月27日）

一个青年作者的墮落

——批判刘紹棠右派言行大会的報導——

刘紹棠是在党的直接栽培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者，今年才22岁，但他却忘恩負义，在今年春天的大风浪中充当了反党急先锋，墮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10月7日起，首都青年文学工作者1千余人，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和中国青年报等三个单位联合主持，连续举行3次大会，揭露、分析和批判了刘紹棠的浅薄无知然而狂妄自大以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事实和原因。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作协书记处书记严文井、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及中国青年报编委陈棣；还有刘紹棠入党的介绍人从药汀、原中共河北通县小辛庄乡支部书记韓廷俊、北京第三机床厂王恩宇、北京国棉一厂工人范以本、北京大学学生吕迺岩、天津作协分会張学新、北京市文联高延昌等同志。团中央宣传部长楊海波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

狂妄自大 叛党反党

刘紹棠生长在河北运河平原的农村里，小时候爱好文艺，讀过不少旧小说。解放后他在中学讀書的时候，曾写下了“紅花”、“青枝綠叶”、“大青骡子”、“布谷鳥歌唱的季节”等反映劳动人民新的生活的小說。他的写作在我們这个社会里，得到了领导和讀者的关怀、支持和帮助。1950年，当刘紹棠的作品还十分粗糙，但透露出一定的生活气息和創作才能的时候，“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就象发现了一颗鮮嫩的文学幼芽一样，开始不断地施肥、灌溉，发表他的作品。

“中国青年报”近5、6年来，在报上每次发表他的作品，都要請社內老同志反复研究他的原稿，并介紹周立波、沙汀、严文井、康濯等老作家，經常指导和帮助他。在寒暑假中，报社还特地邀請他去学习政策文件、文艺名著，或者出路費让他到东北、河北、湖南等地农村去体验生活。团中央書記胡耀邦同志也專門找他談过話，从政治思想上指导和帮助他。正象刘紹棠自己在他的第一个小說集“青枝綠叶”后記中所說：“我，一个直接由党栽培起来的青年，即使有星星点点的成績，也都是渗透着党的心血的。”但是刘紹棠沒有牢牢記住这一点。党的关怀，讀者的称誉，沒有使他更加謙遜謹慎，而是得意忘形。他在一片贊揚声中越来越驕傲自大，越来越追求名利和享受，縱容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同时，又不愿再回农村，投身到火热的劳动和斗争中去。在創作上也选择了閉門造車的“捷徑”。他自知党和人民不允許他走这条資產階級的道路，便处处感到不“自由”，覺得党的领导和党的文艺方針政策，妨碍着他的創作和“天才”的发展。他便逐步与党对立，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在大鳴大放初期，刘紹棠在北京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在“文艺报”和北京市文联举行的座談会上，以及他在“文艺学习”、“北京文艺”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和党的文艺方針进行了全面系統的攻击。

刘紹棠惡意地詆毀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对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指导作用。他把这部偉大的經典性的文件，割裂为“綱領性”和“策略性”两个部分。把文艺为政治服务、面向工农兵的以“普及为主”的方針誣指为“策略性”理論，說是这种“策略性”的理論，对于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只是起了“促退”而不是“促进”的作用；我国15年来沒有产生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作品，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結果。刘紹棠攻击他所称的“策略性”理論，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党所领导的文学事业的成就，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